

社會團結經濟與災後產業重建：Karl Polanyi 觀點的取徑

林淳華¹

摘要

台灣災後重建之文獻以家屋重建、心靈重建為主，但是較少觸及到產業重建，而產業重建比家屋重建更為重要，因為經歷一場災難之後，居住處可以將就是臨時屋、永久屋，但是災區經濟重建攸關災民家屋重建、基本生計、小孩的教養費，同時還有其他社會連結之功能，如交換、互惠、再分配等功能。

而社會團結經濟的特徵和災後的經濟重建相似，但是社會團結經濟規範性敘述強，但是理論分析薄弱。而 Karl Polanyi 的將經濟視為一種嵌置過程，經濟鑲嵌在社會中，原始部落之經濟有互惠、交易、重分配之特色，正好提供災後產業重建之理論分析。

本文則嘗試以災後產業重建當作研究之主題，以社會團結經濟之論述，同時以 Karl Polanyi 的理論釐清災後的產業重建，試圖將災後的經濟重建的經驗，以社會學理論重新審視之。

關鍵字：社會團結經濟、災後經濟重建、Karl Polanyi、嵌置過程

¹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e-mail: d98550003@thu.edu.tw

Solidarity Economy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A Neo-Polanyian Approach

Chun-hua L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Most of the essays about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revolve around houses' rebuilding and psyc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but only few of these essays touched upon economical reconstruction issues. I would argue that the economical reconstruc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houses' rebuilding. While houses' rebuilding only matters for people to choose temporary or permanent houses after a disaster, the economical reconstruction, however, is even more crucial not on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rebuilding houses funds, living expenses and children's tuitions, but also to be highly related social functions such as exchange, reciprocity and redistributi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olidarity economy are similar to economical reconstruction after a disaster. Solidarity economy literature so far is good at normative description but fail to develop into a theory,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I employ a neo-Polanyian approach to fill this gap. This approach inspired by and derived from Karl Polanyi's core ideas such as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economy is embedded in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primitive economy is focused on social relationship".

By using a neo-Polanyian approach to post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nrich extant solidarity economy literature and to contribute to provide economical reconstruction framework as well.

Keywords: solidarity economy, post-disaster economical reconstruction, Karl Polanyi, instituted process

前言

全球災難事件層出不窮！災難社會學所探討議題包括芝加哥熱浪、Katrina 颶風、2003 年南亞海嘯、911 恐怖攻擊、全球暖化、流感恐慌、生化恐怖攻擊等 (Klinenberg, 2006)。而台灣更是位於全球災難的熱點上，近年來的天然災害，以 1999 年的 921 地震最嚴重，芮氏規模 7.3，地震斷層通過南投縣、台中縣，造成 2 千 4 百多人死亡，房屋全倒 3 萬 8 千多戶，經濟損失達 3 千 6 百億元。其次是 2009 年 8 月的莫拉克颱風，土石流將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正在沈睡的²577 人全部掩埋，相當於滅村，連同南部的原住民部落罹難者，總計 678 人死亡，農業損失達 159 億元。

災難的研究議題包括國家、機構、政治、階層議題，理論有功能論和批判理論角度並存，災難研究雖然在水利、工程、社會、社工、建築等學科開花結果，在社會學家對於災難研究關懷中，卻愈來愈希望學科之整合，提出大哉問之問題：人們以何種動機來反應災難？人們以如何解決立即或長期災難的威脅？社會系統如何吸收災難之影響性？災難的長期結果為何？災難過後，真的需要重建嗎？值得研究深思 (Kreps, 1984)。

不論目前災難研究多熱門，或是社會上內在、外在的誘因催生災難研究 Quarantelli & Dynes (1977) 他們認為，實證論述仍是災難研究之趨勢，但是對於實證內容或問題都要保持懷疑，他們建議災難社會學研究者要考慮三點：新世代要建立新的實證性論述、對於實證性的認知保持懷疑、對於實證性的問題保持省思。

除了實證論述不可盡信之外，災難研究亦缺乏新觀點之方法學論述，本文以災後的經濟重建出現資本主義市場、另類的市場經濟形態，而災後的另類的市場經濟重建則擬似社會團結經濟，社會團結經濟源自於拉丁美洲，主要是對抗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失業、貧窮 (Maria Eugenia Castela Caruana & Cynthia Cecilia Srnec, 2012)，災後經濟重建如同社會團結經濟一樣，經濟形式多元性，同時難以斷定什麼是成功的個案，並且，以社會團結經濟分析災後經濟重建則會出現分析的局限性。

從社會團結經濟來審視災後經濟重建，則缺乏理論、方法學之基礎，而 Karl

² 高雄縣市在 2010 年合併，莫拉克風災時，高雄縣市尚未合併，因此延用合併前的舊地名。

Polanyi 的取徑理論和方法學，正好彌補社會團結經濟所欠缺理論的部分，本研究則提出過去之研究缺乏災後經濟重建議題，而經濟重建又缺乏理論基礎，於是本文提出以社會團結經濟和 Karl Polanyi 理論，作為災後經濟研究之新嘗試。

一、災後研究缺乏以新觀點來詮釋經濟重建

地震是災難文獻中最重要的分支，地震和其他火災、風災、旱災比較起來，地震之特殊性是目前科技難以預測災後時刻與規模，無法災前防範，因此震災之分析集中於災後重建（Drabek, 1986: 87-89；引自林宗弘，2012），另外，八八風災的土石流災難亦無法事先預測，因此風災過後的文獻仍以災後重建為主。

1-1 家屋重建

災後重建之相關研究，以家屋重建為主。921 地震之後，謝英俊進入日月潭邵族災區，幫助居民重建傳統竹屋，他以就地取材當作重建的建材，由災民自行建屋，協助所有房屋安全和技術上的諮詢。陳信行（2004）認為這是台灣「適當科技」的第一個。

協力造屋是環保的、永續的、綠色的、符合弱勢族群生存的經濟模式的，但是推動起來則遭遇到社群原有的社會結構力量之阻撓。災後規劃部落阻力來自於經濟因素，家屋成為商品化之操作，營造也被視為一種專業，布農族人按照營建市場操作，在部落蓋房子，要負擔兩、三百萬元的貸款，如同在台中市區購屋一般，是經濟沈重之負擔，部落族人後來紛紛搭建簡易鐵皮屋，是解決重建問題階段性的策略。而邵族的協力造屋屬於非正式住宅，這種協力造屋讓原住民都可以放諸於房屋興建的生產線作業中，因為成本低，災民將住宅補貼變成住宅供應，但是仍不失為在社會發展不平等和住宅商品化的兩大結構下，找到災後原住民家屋重建的一個出路（東海建築工作隊原住民組，2003；蔡培慧，2001）。

921 地震之後，在邵族的自力造屋中發現另類家屋重建的可能性，在 88 風災過後，原住民部落在災後家屋重建中，發現社群、部落主體意識。吳嘉苓（2015）發現重建家屋過程會有使用者、設計師等介入，最後災民認為的安全屋宇是鋼筋水泥屋前搭上涼棚，這種混搭建築是「適當科技」展現，家屋的主體性從建築師轉移到災民身上。

慈濟大愛村是八八風災房屋重建之聚焦點，興建過程有國家、宗教、財團、技術官僚社會力之介入，而原住民發起社會運動來對抗之（丘延亮，2010）。原住民不落也再生成主體化運動，反對政府干預和去媒體治國（陳永龍，2010）。在原住民家屋重建過程中，看見了社福組織缺乏反殖民意識，忽視了原住民主認為家屋是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場域（王增勇，2010）。永久屋之分配也是災區資源之重分配，一方面以特定區域驅離原住民，一方面以永久屋利誘原住民，最後造成原住民和土地之脫嵌（謝志誠等人，2012）。

以魯凱族遷村為例，第一次從山上舊好茶村遷到新好茶村，魯凱族人接近資本主義社會，可視為第一次災難，第二次部落災難是風災過後遷居到瑪家農場，遷村宛如「飛地」，族人仍以文化、階級意識等來填補文化之失落（台邦·撒沙勒，2012）。陳建甫（2003）也發現，921地震後未參與部落、學校重建的原住民學生，對於社群認同低。

在災後社區重建跨國比較研究中，政治體制社會資本都納入災後重建比較中。林宗弘（2012）以921災後的集合式住宅和512四川地震統規統建之災後重建跨國比較中，發現威權體制比民主體制更容易導致社會不平等和災民之抗爭。Nakagawa & Shaw（2004）比較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和2001年印度古茶拉底地震社會資本是重建重要的因素，Soni村有銀匠、金匠，是一個社會連帶強的社區，進行集體決策、集體行為都是有效率的，社區連帶是重要的重建因素。

921地震後的家屋重建，發現適當科技家屋可能性，88風災則建立文化主體性，反對福利殖民，這些都是有形的家屋重建所發現的研究結果，至於無形的心理重建，則發現災民要重回原本的文化脈絡、社會關係中，才有助於心靈重建，以下分述心靈重建之發現。

1-2 心靈重建

除了家屋重建、遷村和社區重建之外，災後心靈重建也是重要分支。容邵武（2011）在南投縣國姓鄉民對於地震災難論述中，詮釋災難是命、欠債、討債的觀念，隱含道德社群觀念、正義的判準。災民在這樣災難敘事和詮釋過程中，則以做義工，讓善者更善。災難過後的社區回歸正常，也看到災後的村落有堅強的連結網絡，而這樣的連結網絡更是靠社會關係和公道、正義得以表現出來。

林耀盛（2003）以紮根理論建構本土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徵兆，他發現在地震後的一、兩年間，災民呈現空間崩坍、自我瓦解、尋求身心平衡之槓桿、對於未來的佈局、轉化災難經濟重構世界等，這五種的指標正指涉災民在生活上尋求心理重建，促使個體重新返回現有空間，重構在世間存有的關係。

921 之後的出現創傷症候群包括災民、災區工作的軍公教人員、災區工作的 NGO 團體等，除了精神科團隊至災區治療之外，還有藝術工作者至災區進行藝術治療，如差事劇團³、紙風車劇團、客家創作歌手林生祥、攝影師李文吉⁴等人。八八風災之後，文建會補助演藝團隊災區藝文陪伴進駐計劃⁵、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三年計劃⁶，本著「文化可以支撐生計」之精神而推出該計劃。

無論是外來的藝術家、精神科醫師都因為在地鑲嵌性不足，而面臨找不到災民之苦。王美懿等人（2014）發現以精神科為主體的醫療行為讓醫療行為窒礙難行，因此轉向為以社區為主體、在地性的醫療工作人員為主，集體性治療取代個人治療。

災後重建包括家屋重建、心靈重建，相關文獻豐富，議題多元性，同時觸及了文化主體性、心理治療、社群連帶、殖民霸權等概念，但是卻缺乏經濟重建相關的文獻，在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37 名委員中，只有經濟部長一人是經濟學家。反觀，美國學者分析在 Katrina 災後，重建社區和生活重建中，必須發展物質和社會鑲嵌的資源，撐起災後重建板凳的三腳椅子就是經濟、社會文化體系、政治法律體系（Chamlee-Wright & Storr, 2010），可見三者是災後重要的關鍵角色。

在實證資料中也發現，災民在精神科治療過程中，主要是擔心災後的工作和家計生活之問題，精神科醫師難以伸出援手，而台灣政府災後政府投注的人力、物力，也被詬病為無助於社區關係建立、在地產業的重建，重建方向和地區需求產生落差，而讓災民更仰賴政府（王美懿等人，2014）。

1-3 災後經濟重建

3 差事劇團進入石岡災區，成立石岡媽媽劇團。（張容嘉，2013，〈未竟的蛻變：災後女性角色的開展與困頓〉。《思與言》51 (1): 155-186）

4 林淳華，2000，〈藝術療傷，災區請來大師〉，中國時報，第 20 版，4 月 13 日。

5 見「演藝團隊災區藝文陪伴進駐計劃作業要點」之公文。

6 見「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 3 年計劃」之公文。

災後經濟重建文獻中，倘若社區有傳統產業，則社會資本高，則產業復原速度快。Nakagawa & Shaw (2004) 發現 Soni 銀匠、金匠聚集的村落中，網絡、信任、社會規範、社區領導人、集體行動滿意度都非常高，加深社會資本、社區、草根觀點在經濟重建之重要性。在一項有關音樂城市如何推動災後復原研究中，音樂人會運用社會資本進行災後復原，但是社會資本有其複雜性，有些音樂人鑲嵌在既有的社會資本中，有些則依靠外來資本，災後之資本補助沒有名氣的音樂人，這樣反而對於城市產業的復原不利 (Chamlee-Wright & Storr, 2010)。

國內 921、88 風災之後，災後重建文獻以家屋重建為多，探討經濟重建議題之文獻並不多，本研究以次級資料將政府在災區推出的經濟方案分類和分析，次級資料包括災後重建政策白皮書、雜誌、地方媒體報導等。

官方的統計資料中，921 產業受損之災民有 16% 是農民，農民之果園、田地等農業固有資產受損 39 億元，還不及埔里、南投兩酒廠存貨損失 42 億元。政府產業重建報告中，以恢復原有可經濟計算為主，流失的農田也以賠償金額來補償，農民災後復原則以農會補助、紓困貸款等方案進行。921 災後補助以農地為主，但是忽視原住民依賴是林地 (瓦歷斯，2014)。

李丁讚 (2010) 卻認為形成災難的結構性因素就是土地商品化，因此以重回土地進行災難社會之重建，以土地共有財之觀念，將城市資源挹注在鄉村土地上，農村設計為綠色學校，並建構綠色生活圈。他建議，兩千億元的農村再生條例對於農村之適當定位和宣示，才是重建成功之關鍵。

公部門對於災區失業人口，推出就業服務措施，建立求職單一窗口，一項資料顯示，靠近平地的災區，有 9601 人登記，3666 人媒合成功。山地災區登記有 423 人，媒合成功 60 人。這項措施中，媒合不成功之重要因素，在於徵才工廠在地鑲嵌性不足，以東勢重災區為例，徵才廠商必須到大雅、后里工作，騎摩托車要半小時以上，災民家中還有受傷的家人、老人需要照顧，中午必須回家餵食，無法遠離東勢而工作。許多災民也上過職訓課程，如版模、鋼筋、烹飪、美食等，但是擁有這些執照，卻遇到開店的資金不足，或是沒有公司願意雇用。

88 風災之後，為了安置大愛村原住民的就業問題，財團興建永齡農場，經過三年之後，原住民員工剩下 80-55 人之間，佔員工之五成，由於勞動條件苛刻、臨時

工轉任正職拖延、以農業科班畢業生取代大愛村原住民，完全失去當初創農場提供災民就業機會之原意，且六年內若無法轉型合作社，則由農業銷售公司經營。

以工代賑亦是重建大軍就業方案，包括福利保健、環保生態、文化教育、觀光休閒、美化綠化、社區營造、農業轉型等，官方資料統計共有 3107 人參與。災區的東勢、和平崩塌地整治工人（俗稱蜘蛛人）最多有 2000 人，兩成是女性，一天 1500 元。2002 年總統陳水扁還親自到工地，以無線電慰問蜘蛛人：「非做工，是做功德，生態工程全世界少見」。工人形容是「這種工作是向公所拿錢，為公所賣命」。蜘蛛人是最在地鑲嵌的工作，團體工作，生活規律，工班以在地的果農結集，考量安全性，只要下雨天就不出工，公所可栽培選舉樁腳，人生第二春也發生在工班中。

以工代賑最讓災民詬病是隨時會停斷，2001 年初災後課後托育媽媽聘任漸漸減少，這些托育媽媽都曾經上過彭婉如基金會托育課程，一個月一萬五千多元工作就斷炊了，災區安親班無力吸納從學校轉任的課後托育媽媽。88 風災之後的以工代賑一天 800 元，被形容成「八百壯士」（王美懿，2014）災區的「八百壯士」依賴政府每天的工資八百元，放棄部落農業，未培養專長，工作價值觀扭曲，一旦政府撤銷補助，果農連原有的工作能力都喪失。

災後社區營造搭配農業休閒轉型和 2000 年實施周休二日，社區營造目標在於吸引觀光客到災區，諸如谷關社區發展協會、松鶴社區發展協會、新社產業發展協會、大雪山社區發展協會、東勢產業協會，理事長是飯店、庭園咖啡、民宿、餐廳之業者。社區營造可申請的竹屋涼亭、溫泉促銷活動、社區街道清潔工等經費補助。

柯于璋（2005）社區主義之理論是對抗是新自由主義，鼓勵社區參與公共事務，透過利他、博愛、服務等來培養社區意識，理論上社區主義和環保抗爭、安全社區等結合。

但是在災區社區發展則與產業經濟結合，卻和更大的公共利益衝突，例如新社的庭園咖啡，開發「最遠的咖啡館」，庭園咖啡最多達到 40 多家，是災區產業營造成功之例子。但是庭園咖啡產業並未和在地果農鑲嵌，使用當地的食材、推銷農產品等，徒留垃圾、塞車，庭園咖啡山坡地大面積開發，也影響到生態環境。

社區概念是公民社會，但是卻忽略族群的差異性，部落收編在社區中，而原有

的部落階級、族群之差異性變得模糊化。瓦歷斯（2014）認為災後的原住民部落在經濟壓力下，貸款土地、無土地生產，無法累積教育資本，部落在貧窮中無法翻身，而社區營造建築師脫嵌於社區，認為在地居民是去技術化、去教育化。

災區推出的文創產業，在政府補助就業大軍計劃中斷、職業訓練結束之後，這些文化資產在市場壓力下消失。三叉坑災民將泰雅族編織技巧編織手機袋，一年之後，就出現滯銷，需要消費者認購。美麗山城工作藝術室訓練 20 位東勢媽媽絞染，藍染是客家傳統，柿染可就地取材，而這些絞染絲巾在日本可以賣到 1500 元，但是這些媽媽後來都沒有繼續從事絞染事業。愛鄉協進會推出客家花布製作成流行的服飾和制服，最後也歇業。東勢石圍牆酒莊、石岡媽媽傳統美食小舖是 921 災後接受政府資源，如今仍繼續營運的。

88 風災之後，阿里山鄒族的茶山雜糧產銷班以三贏的經營形態，捐款人捐錢讓產銷班購買小農良品，包括茶山雜糧班農產品，然後捐這些挑選過的良品給弱勢者，產銷班從受災區、重建區、援助區，產銷班使用小農的產品也來自東勢災區，分發給風災後原住民受創部落。他們是災區之間的互相合作，加入第三者捐贈資金，連結三者之間是信任。

縱觀而言，災後政府經濟部門補助的經濟重建方案，屬於治標不治本，失業則讓災民充分就業，提供一天 800 元以工代賑、1500 元的蜘蛛人工作，暫時解決失業問題，但是隨著補助善款結束，這些工作時間短則三個月，長則三年。

民間企業提出的就業機會則是去鑲嵌性，會增加災民交通往返的安全風險，也無法照顧災後生病家人和整理家園，卻被官方認為災民不具有工作競爭力，走不出東勢大橋。新社庭園咖啡投資者是外來人，利用災區的好山好水賺取觀光財，並未與在地產業、人力結合。永齡農場以工廠生產線管理來管理員工，迥異於原住民在山上的務農經驗。

在地產業需要培力，複製客家風成衣都是客家媽媽，而客家風成衣設計師則是外地人，大量複製成衣可以短期獲利，但是對於培養客家媽媽成為客家庄設計師則毫無幫助。文創產品培力需要時間、上課、挖掘地方特色，官方不從事這些長期的培力工作，而直接由公部門大量購買文創產品，解決滯銷問題，形同同情購買，文創產品最終泡沫化。

災區仍有傳統農業產銷制度，以東勢為例，在 1977 年成立的東勢高級水梨生產研究班高接梨產銷班之後，在 921 地震之後，仍舊維持 102 班的高接梨產銷班，耕種面積 1600 公頃，成為地方經濟主流。地震之後，產銷班也接受政府補助重建果園引水設施、水塔、農田流失等，當政府推動的就業大軍、以工代賑、社區總體營造因不再補助而結束之後，當地的高接梨產銷班仍繼續運作，支持災後房屋重建和生活需求等經費。

1-4 小結：

921 地震後的家屋重建，在商品化的房屋操作之外，邵族自立造屋看到另類的家屋重建的可能性，而在 88 風災之後的原住民集體遷村大愛村引發的原住民運動，凸顯的是災民對於家屋不只是房子的其他想像，有家庭生計、耕種漁獵、傳統領域的山林打獵，催生或是阻撓這些家屋的想像，則包括原住民主體性、社區再生成、福利霸權主義。

官方對於災區振興經濟方案，則出現短期獲益、減少失業數字之思維，提出工作機會則是去培力、去鑲嵌化之形態。但是也存在碩果僅存的另類的經濟形態，如石岡媽媽傳統美食小舖、石圍牆酒莊、茶山雜糧班。而在地鑲嵌的高接梨產銷班仍是維持災區經濟命脈的，921 地震之後，企業家提出工作機會和造鎮計劃，但是東勢鎮長直接表明：「認購水梨最實在！」

二、從災後重建到社會團結經濟

在災後家屋重建和遷村的過程中，發現社區、部落之存在。而在經濟重建中，社區發展協會就是以社區為主體，但是災後的社區，行觀光、促銷文創產品，傾向產業協會營利組織為主體，雖然偏離西方社區主義之公民社會是透過服務、博愛、利他參與公共事務，培養社區意識之理想，但是台灣災後的社區發展是符合災後經濟產業重建的的實際狀況，災民在災後除了家屋重建之外，最重要有經濟能力自力更生。

2-1 社會團結經濟

台灣災後的經濟重建仍需依循市場資本主義運作，但是必須固守土地、家園、在地文化，這樣的災後經濟產業符合社會團結經濟之特色。1937 年西班牙內戰

Felipe Alaiz 提倡城市和郊區工人團結經濟，團結經濟第一次作為經濟組織（Kawano et al, 2010）。巴西的 Singer 在 1998 年提出團結經濟的概念，Singer 以及巴西學者 Arruda 和 Mance 等認為團結經濟根基於馬克思理論，社會能動性在於社會、經濟組織的上層結構，團結經濟之原則就是要打破新自由資本主義所謂的剝削和族群分裂。在資本的積累和階級連結過程中，同時揭露馬克思理論中人類本質的觀點，經濟生產存在著社會關係結構。（Mance,2002, Singer, 2002, Arruda, 2006;引自 Esteves, 2011:46）。

團結經濟是市場經濟之外的不同經濟，是生活再延伸，團結超越組織行為、經濟，是在不同經濟理性下的組織原則，同時了解財產、交換關係的新方法（Srncic & Caruana, 2012）。團結經濟不但具有多義性，同時在不同地方會不同的團結經濟形式。我根據 *Envisioning Real Utopians*，將團結經濟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區分三種類型：斷裂轉型（ruptural transformation）、間變轉型（interstitial transformation）、共生轉型（symbiotic transformation）的三種分類。第一種斷裂轉型指的是革命式的團結經濟，採取激烈的手段，完全和自由競爭原則背道而馳，以公平、多元、民主參與、合作、互惠為原則，以攻擊新自由主義政府當策略，反制新自由主義之滲透則代表成功。

第二種是間變轉型的團結經濟，團結經濟是提出一種資本主義之外的替代方案，不是對抗資本主義，對於資本主義也起不了完全的替代作用，但是包含平等、培力、社區多樣性等概念，團結經濟讓弱勢翻轉階級、遍地開花就是此轉型的成功。

第三種共生轉型是指社會民主，社會力和勞動力結盟是行動者，採取和資產階級合作，利用國家來進化、適應，進化成功就是代表轉型的成功。這種團結經濟是借力使力、乘風而行，和資本主義是共生的關係，利用現有資本主義的優勢，來達到社群團結之目的。

社會團結經濟有不同面貌，以下分述幾項與災後經濟重建的共同處之團結經濟形式，回應災後經濟重建所應觀照的各層面。

（一）公平貿易⁷

公平貿易剛開始是指北半球消費者採購南半球的咖啡，減少中間商的剝削，同時讓咖啡農得以有基礎溫飽，又不會破壞南半球的生態環境。除了咖啡之外，可可採收園和非法的兒童販賣結合，降低採收成本，高價的巧克力背後是採收可可的黑暗面。⁸

在 1986 年 Massachusetts 推動的工人咖啡合作平等交換，工人的咖啡來自南半球一群咖啡小農的農產品。1990 年代，這種平等交換成為公平貿易運動，企圖創造公平貿易全球標準，且商品來自公平貿易標準認證。最近幾年，官方、星巴克等接受公平貿易認證，導向咖啡認證標準的稀釋化，引導南半球的大型農場咖啡商品化的成長，於是 Just Coffee 退出公平貿易認證，創造直接連結的合作，採購南半球生產咖啡，在北半球烘焙、銷售。

公平貿易⁹是傳統貿易關係之外的另一種貿易體系，建立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長期伙伴關係，對生產者而言是農產品有保證收購價格，且不會隨市場浮動，而對於消費者而言，則可以在消費過程中，改善生產者的貧窮之問題。

（二）玻利瓦歷程（Bolivarian Process）¹⁰

在依賴全球化經濟之下，扭曲委內瑞拉的社會結構，若使用馬克思理論反對全球化經濟，則因委內瑞拉的階級結構和歐洲的馬克思理論相去甚遠，於是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實施玻利瓦歷程（Bolivarian Process），這是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南美洲政策發展的新方向，以去殖民化為原則。

玻利瓦歷程是從上而下、從下而上進行反殖民主義，這種過程強調國家的角色，扮演強力的介入，PSUV 黨員想像的國家不是代議制度下產生的布爾喬亞式的國家，而是公有制的國家。

⁷參考《咖啡正義》紀錄片、《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紀錄片和書

⁸《巧克力的黑暗面》紀錄片，2013，台北：輝洪。

⁹根據 Fair Trade Labelling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對於公平貿易之解釋。

¹⁰ 西蒙·玻利瓦（Simón José Antoni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Bolívar y

Palacios，1783 年 7 月 24 日 - 1830 年 12 月 17 日）是南美洲脫離西班牙帝國統治之領導人，玻利維亞的命名紀念西蒙·玻利瓦，Bolivarian Process 之翻譯取玻利瓦式的反殖民帝國之歷程，並非指玻利維亞此國家之成立歷程。

玻利瓦的歷程是兩股社會力積累，由上自國家，由下來自底層（原住民運動、勞運、農民運動等），國家介入是積極培力底層人民，提供技術、教育、機會和資金等，以農作物為例，委內瑞拉過度重視進口，不重視出口和在地生產之農作物，於是國家支持社區農業，政府提供 980 台卡車支持農作物之運輸，減少農產品運輸過程中的成本，成立全國共同生產市集，用公費建立水果處理工廠、研發蔬果可得到基金贊助，這些都是共有制政府所為。

委內瑞拉在實施合作過程中，發現農民仍是資本主義概念下的網絡獲益極大化思維，獲益並未支持社區發展和讓新成員加入，於是國家就介入翻轉合作關係，合作要在由社區主導之前提下進行，如此，國家主義和合作主義並行而不悖。

（三）里山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大量生產，大量人口消費來促進經濟成長，但是在日本人口停滯之後，工廠生產的產品滯銷，日本阪神地震、311 海嘯災後，日本出現反市場資本主義的趨勢，他們發現城市在災後缺乏燃料、飲水、食物，無法自給自足，但是災後的鄉下地方則繼續災後維生系統。天災讓金錢資本主義停止，鄉下地方才是走在世界的前端，而所謂的里山就是介於山上、平地之間的聚落，這些小鎮曾經是木業、煤礦、火力發電產業，產業消失則小鎮沒落，但是災後又出現年輕人回到里山¹¹，承租當地人之土房子，開民宿、餐廳，讓里山復活。

（四）隱藏經濟（Cache economy）¹²

隱藏經濟是難以用金錢還衡量的，是基於合作，而非交換，給予別人財貨、服務，但是回收的不是金錢，而且是來自其他的參與者的回饋，這種隱藏經濟難以捉摸，在帳面上難以估算金錢價值，最常見是家人、社團朋友、陌生人之給予和接受，而陌生人之間施與受則是「自由軟體運動」交換，雖然在經濟回收中看不到金錢數字，但是確實帶來網路社群難以計算之隱藏經濟。

Benkler (2005)認為分享是一種新趨勢，長期穩定之合作可以孕育互惠和信任，使參與者互蒙其惠，他最常舉例是捐血、接送鄰人小孩、團體中分享知識，若分享

11 《里山資本主義》書中的里山是指岡山、廣島、山口、島根、鳥取，引申為山地到平地之間的聚落，在台灣就是指不山（不是山地）不市（不是城市）地區，中部地區如大坑、埔里、東勢。

12 參考 http://homepages.inf.ed.ac.uk/fmi/brain/Cache_economy.htm

是一種重要的生產形式，經濟學理論就不該再把持金錢導向之動機，而是朝向社會導向之動機改變之。

儘管社會團結經濟各種實踐不同，但是都納入社會團結經濟之定義中，因此廣義來說，團結經濟是一種實體經濟，強調經濟鑲嵌在社會中、去中心化、合作、多元性等，這些都可以納入社會團結經濟，也可以解釋災後經濟重建需要在地化，生產合作社，生產、分配、交換等多元經濟組織，由下至上的決策，社會團結經濟提供災後經濟重建的新觀點。

雖然 *Envisioning Real Utopians* 將的斷裂轉型、漸變轉型、共生轉型三為團結經濟分類，但是考慮歷程(process)之因素之後，會發現團結經濟發展階段，可能都具備以上三類轉型，斷裂轉型陣亡之後，運動進化成為共生或是漸變模式，也缺乏解釋為何有些社會團結運動可以進化？有些團結經濟之社會運動則是陣亡？有些陣亡的運動會帶來積累能量，這些「隱喻」，則無法在三種絕對分類中看到運動中隱藏的裂縫和新生運動之發芽。

但是社會團結經濟實踐能力強，相對理論薄弱，團結經濟運動生氣勃勃，但是內部策略、戰略嚴重分歧，當提出改造主流經濟，包含內容可能有極限的，但是團結經濟的極限要該如何界定呢？（Kawano et al., 2010）

另外，社會團結經濟積極內部同質組織連結，也和外部的異質組織連結，但是缺乏和理論之連結，因此團結經濟運動缺乏連貫性的方法學和理論之基礎，會造成分析的薄弱，限制在描述性、規範性的陳述上，讓災後經濟重建成功者看似每個都是團結經濟，那其核心的內涵、價值、信仰為何？團結經濟成功定義又是什麼呢？

2-2 Karl Polanyi 取徑

Karl Polanyi 的知識遺產最大的啟發是歷史社會學（Block & Somer, 1984），在《鉅變》書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百年和平之崩解，主要是來自於市場經濟造成土地、人力、資金商品化，成為工資、地租、利息，市場經濟極大化之操作，忽視了土地、人力、貨幣社會之意涵，而以人力商品化則導因於英國濟貧法，政府救濟無工資之貧民，而將農村勞力驅逐到工廠當工人，工人領取工資，而鄉下的貧民則領取救濟金，許多鄉下不堪領救濟金而降低自尊者，則往城市移動，將人力資本轉換為生活溫飽的工資，濟貧法卻帶來鄉下往城市的就業大軍。

土地商品化歷史之歸因於在英國都鐸王朝（1485-1603）的領圈地運動，早期圈地是將耕地變成放牧地，當時田野、公共地都被貴族圈起來，鄉村農民沒有放牧區，人口銳減，被視為貴族對抗窮人之運動，但是英國皇室適時阻撓圈地運動所帶來的災難，遲緩經濟之進步，同時救助鄉村之貧民，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市場經濟控制土地，缺乏自律市場對峙，因此讓土地商品化加劇變化，因此這種土地商品化之過程，Karl Polanyi 也是依據歷史來推導。

因此，歷史社會學是 Karl Polanyi 分析之方法論，他的歷史分析是採取類似亞里斯多德之傳統，將人類事務的研究視為社會學的，是採取整體之思考，任何一部分都不可偏廢（Block & Somer, 1984）。

因此，百年和平是要預告山雨欲來風滿樓，那歷史中有哪些整體性的思考，可以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金本位崩解呢？Karl Polanyi 包括四種崩解之因素：力量平衡體系、全球金本位標準、自我調整機制、自由國家，其中經濟制度是自我調節機制、金本位標準，也屬於國家分析層次。政治力是力量平衡體系和自由國家，則屬於國際分析層次。Block & Somer（1984）認為這種以制度、多元層次之分析當作百年和平的崩解原因，也是 Karl Polanyi 的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論。

綜合而言，Karl Polanyi 的歷史學和整體式分析，是他重要的方法學。另外，實質經濟、形式經濟之提出，以及經濟視為一種嵌置過程（instituted process），則是提出在經濟除了交換之外，還有分配、互惠和家庭生活的功能。

所謂的形式經濟是目前人類所依存的經濟方式，以虛構商品為例，形式意義是不是為了出售而產生，確具有市場價格而可以買賣。而實質經濟則是多重目的、出於多樣動機和表現多種形式，且未必形成使用價值的人類活動。（許甘霖，2012）

現代經濟重視的是形式經濟，而忽視了實質經濟之內涵，人之動機多元的，市場也是多元的，如今卻簡化為交易的行為。Karl Polanyi 認為當代社會和初始社會一樣，市場發生在社會中，但是當代社會市場只連接到經濟，未連接到社會中。

新的 Karl Polanyi 取向則將經濟視為一種嵌置過程，應用在交換、競爭、創新視為一種嵌置過程，譬如超商取得成為食物供給之獨佔權，毒品使用也可視為一種嵌置過程（Randles, 2003）。Karl Polanyi 的虛構商品和雙向運動是兩個重要之知識遺產，則應用於詮釋農村牧羊人 José Bové 反抗麥當勞跨國企業之個案，最終成為

法國民族英雄（Birchfield, 2005）。

King（2000）提出 Karl Polanyi 的反向運動和社會自我保護用來防止人、土地、金錢之過度商品化，King 研究美國中西部養豬業產業化的結果是成為大型養豬場，工人聘用了附近農場農民，造成離農結果、社區和環境受到大型養豬戶之污染、附近土地因空氣污染而地價下滑。該研究發現，對於鄉村而言，中小型的農場反而可以支持社區教育，提供農民收入，維持基本生計。

潘美玲（2011）闡述有關 Karl Polanyi 市場經濟交易鑲嵌在社會關係中，市場內部競爭、個人利益極大化不存在於藏人的毛衣市場中，取代是經濟鑲嵌在社會團結中，毛衣市場是要讓流離失所的藏人有一定維生的收入，又因為同質性太高，因此不能以市場割喉戰操作，取代協會操作不二價、攤位輪流，以出清毛衣貨源為主。

過去研究曾以 Karl Polanyi 取向研究巴西的團結經濟（Lemaître & Helmsing, 2011），或是以 Karl Polanyi 學說當作探討中南美洲團結經濟之理論背景（Esteves, 2011）至於 Karl Polanyi 理論或方法學尚未應用在災後經濟重建中。

本文則嘗試以 Karl Polanyi 取向的社會團結經濟審視災後的社會團結經濟，Karl Polanyi 和團結經濟互補合一，Karl Polanyi 是取理論、方法學，經濟不只有交換，還有分配、互惠、家庭生計等，重新發現經濟上的社會功能，而其方法學在於整體性，歷史之制度和隱喻之分析。

而團結經濟是取實務上之概念，如玻利維亞進程中國家必要之介入、公平貿易的反剝削、里山資本主義的經濟轉向農村、分享創造無法計算的經濟價值，以這些概念來檢視災後團結經濟之實踐。

參考書目

- Azzolini, Dario, 2013, *The Communal State: Communal Councils, Communes, and Workplace Democracy*. 6月30日。 <http://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9787>，取用日期2015年8月28日。
- Benkler, Yochai, 2004, "Sharing Nicely: 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 *Yale Law Journal* November: 273-358.
- Birchfield, Vicki, 2005, "José Bové and the Globalisation Countermovement in France and Beyond: a Polanyian Interpret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1: 581-598.
- Block, Fred & Margaret R. Somers, 1984,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Pp. 47-84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Chamlee-Wright, Emily and Virgil Henry Storr, 201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rricane Katrina and Community Rebound*. UK: MPG Books Group.
- Drabek, Thomas E., 1986, *Haman System Responses to Disaster: An Inventory of Sociological Findings*. New York: Springer-Verlog.
- Esteves, Ana Margarida, 2011,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co-production of Public Policy and the Promotion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by the Brazilian Solidarity Economy Move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Brown.
- Kawano, Emily et al., eds., 2010, *Solidarity Economy 1 : Building Alternatives for People and Planet*. MA: Center for Popular Economics.
- King, Martin Bruce, 2000, "Interpreting the Consequences of Midwest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4(2): 425-431.
- Krep, G. A., 1984, "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r research."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10: 309-30.
- Klinenberg, Eric, 2006, "Blaming the Victims: Hearsay, Labeling, and the Hazards of Quick-Hit Disaster Ethnograph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 689-698.

- Lemaître, Andreia and A. H. J. (Bert) Helmsing, 2011, "Solidarity Economy in Brazil: Movemen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nalysis through a Polanyi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y." *Working Paper*, 524. The Hagu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 Nakagawa, Yuko & Rajib Shaw, 2004, "Social Capital: A Missing Link to Disaster Reco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2(1): 5-34.
- Polanyi, Karl 著，黃樹民等譯，1990，《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北市：遠流。
- Polanyi, Karl, 1992,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Polanyi, Karl 著，馮鋼、劉陽譯，2007，《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Quarantelli, E. L. & Dynes, Russell R., 1997, "Response to social crisis and disaster."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3:23-49.
- Randles, Silly, 2003, "Issues for Neo-Polanyian Research Agenda in Economic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gy-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13(2): 309-428.
- Spronk, Susan & Jeffery R. Weber, 2011, "The Bolivarian Process in Venezuela: A Left Foru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1): 233-270.
- Srnec, Cynthia Cecilia & Maria Eugenia Castelao Caruana, 2012, "Public Policies Addressed to the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South America. Toward a new Model?" *Voluntas*, published online: 13 March, 2012.
- Quarantelli, E. L. & Dynes, Russell R., 1997, "Response to social crisis and disaster,"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3:23-49.
- Wright, Eric Olin,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ns*. NY: Verso.
- 上下游網站，2015，〈同樣 88 災民 茶山鄒族小農要以自產的良品回饋北部泰雅爾族 同胞〉。 http://www.newsmarket.com.tw/blog/74520/?utm_source=SocialWarfare，取用日期：2015 年 8 月 27 日。
- 王美懿、林東龍、路悌，2014，〈精神醫療團隊於莫拉克颱風災後心理重建之在地實踐經驗：兼論精神社工專業角色的省思〉。《台大社工學刊》29: 97-148。

- 王增勇，2010，〈災後重建中的助人關係與原住民主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 437-499。
- 瓦歷斯·諾幹，2014。《荒野發聲》。新北市：稻鄉。
- 台邦·撒沙勒，2012，〈災難、遷村與社會脆弱性：古茶波安的例子〉。《台灣人類學刊》10 (1): 92。
- 丘延亮，2010，〈不對天災無奈，要教人禍不再：災後民間力量在信任蕩然之叢林世界中的對抗與戰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 363-401。
- 行政院，2000，災後重建白皮書。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網站：
<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921pdf/GSB01.pdf>。取用日期：2015年8月27日。
-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01，〈九二一震災災後處理情形總報告〉，<http://kbteq.ascc.net/archive/erc/erc-p1308.html>。取用日期：2015年8月27日。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0，產業重建計劃，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網站：
<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921pdf/GSA03.pdf>。取用日期：2015年8月27日。
- 李丁讚，2010，〈重回土地：災難社會的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 273-326。
- 社團法人中華建築文化協會、東海建築工作隊原住民組，2003，《部落家屋再生：布農族居住文化之研發與傳承》。台北：浩然基金會。
- 林宗弘，2012，〈災後重建的政治：中國512地震與台灣921地震的比較〉。《台灣社會學刊》50：57-110。
- 林淳華，1999-2003，〈重建企業協進團，前進災區長期服務〉等災後相關報導。中國時報，全國版、台中縣地方版。
- 吳嘉苓，2015，〈永久屋前搭涼棚：災後家屋重建的建築設計與社會改造〉。《科技、醫療與社會

》 20：9-74。

林耀盛，2003，〈書寫創傷：探究「九二一震災」受創者的心理社會療癒經驗〉。

《本土心理學研究》 19:3-64。

柯于璋，2005，〈社區主義治理模式之理論與實踐—兼論台灣地區社區政策〉。

《公共政策學報

》 16: 33-57。

柳琬玲，2012，〈當農民變成農工～“永齡農場”原住民員工的心聲〉，《青芽兒》 54:20-27。

許甘霖，2012，〈從商品虛構到批判論述分析：重新發現博蘭尼的方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8:171-187。

容邵武，2011，〈敘事、正義、記憶：國姓鄉南港村的研究〉。頁 85-104，收錄在《敘事的社會、社會的敘事研究工作坊》。台北：中研院社會所。

陳永龍，2010，〈莫拉克災後原住民部落再生成的主體化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78: 403-435。

陳信行，2004，〈從適當科技運動角度看 921 地震後協力造屋運動〉。頁 84-99，收錄於《技術、文化與家：潭南協力造屋之省思研討會論文集》。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

陳建甫，2003，〈震災經驗、重建行動與社群認同—以南投九二一重建區不同世代原住民為例〉。《台灣鄉村研究》 8 月：43-72。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等。

潘美玲，2011，〈流離的道德經濟：流亡印度的藏人毛衣市場與協會〉。《台灣社會學刊》 46：1-56。

謝志誠、傅從喜、陳竹上、林萬億，2012，〈一條離原鄉愈來愈遠的路？莫拉克颱風災後異地重建政策的思考〉。《台大社會工作學刊

》 26: 41-86。

謝英俊、阮慶岳，2003，《屋頂上的石斛蘭：關於建築與文化的對談》。新北市：

木馬文化。

蔡培慧，2001，《商品化住宅與不平等發展下之 921 災後住宅重建困境與出路》。

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藻谷浩介，2013，《里山資本主義》。東京：角川書局。